

试论罗马帝国农民的负担问题

杨俊明¹, 李 英^{2①}

(1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长沙 410081; 2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长春 130024)

摘 要: 罗马帝国时期农民的负担体现出其随意性、不公平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机构臃肿, 各种费用剧增, 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不仅对罗马帝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而且加剧了罗马帝国衰亡的进程。

关键词: 罗马帝国; 农民负担; 税赋

农民负担指的是农民无偿向国家和社会提供的资金、产品、劳务等各种资源的总和。从一定意义上讲, 农民负担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国家的存在, 能够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能够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 个人必须缴纳相应的税收作为获取公共服务的补偿。这同商品交换一样, 需求者要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 就必须支付供给者等价的货币。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认为, 人们之所以向国家交税, 无不是以税收换取和平安定的环境, 获得由和平产生的社会福利。亚当·斯密认为, 国家应当承担三项义务: 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尽可能保护社会每个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侵犯和压迫; 建设和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 如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等。要实现这些国家职能, 就需要一定的经费支出和财政收入, 人们要获得公共服务, 就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收。

—

罗马帝国时期的农民负担, 主要是指农民的税收负担和各种劳役。一定的农民负担是必要的, 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是, 这个负担要适度, 即农民负担要确定在农民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围内。合理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是农民向国家、

社会集体所承担的税费状况, 另一方面是农民的收入状况。根据这两方面及弗兰克的研究成果来估价罗马农民负担的情况, 罗马税收在开始时确实是必要的、合理的, 也是适度的, 罗马真正需要大量国库资金最先出现在长期的对维爱的战争之后, 这是对罗马人的财产开始征税的标志。但就总体而言, 罗马农民的负担在此时很轻, 因为这时的“这种费用很少, 基本只够士兵支付口粮的价款”。^{[1]189}在早期共和国, 罗马国家的支出极少: 这时的军队由公民组成, 没有军饷而无偿服役; 行政官员人数不多, 并且不领取薪金; 官员们为了讨好民众, 还自己出资修建公共工程。但到罗马帝国时期, 农民负担却在不断地增加。在古代罗马, 农本经济是基础, 农业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 农民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提供者。在古典时期, 大多数的产品和财富都是由土地生产的。琼斯指出, 农业税和农村人口实际上支付了国家的全部费用, 帝国 93% 的财政收入和全部的财富都来自农业。^{[2]152}

农民负担可分为两部分: 合理负担和不合理负担。综观罗马帝国农民负担情况, 其表现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 随意性。帝国政府对农民税赋的收取和开征都是随意的, 缺乏规范。在农民税赋的收取上, 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并存; 哪些该收, 哪些不

① 收稿日期: 2008-02-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06JA770014)

作者简介: 杨俊明, 男, 湖南湘潭人,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史、世界古代史; 李英, 女, 湖南宁乡人,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博士生。

该收,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定标准,许多收费规定都没有经过立法机构的批准。因为到帝政后期时,法律完全由皇帝以敕令的形式颁布,所有官吏也由皇帝任命,各种议会已先后停止活动和废止,元老院议员也不再立法,元老院已降为罗马市议会的组织,不再是全国性的政治机构。“到公元三世纪初,元老院不再作立法性质的工作,而由皇帝直接颁布敕令来代替立法。”^[3]也就是说,在帝政后期,皇帝独揽立法大权,其行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就决定了帝国政府绝不会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因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农民税赋的应用上也不尽合理,如皇帝们大吃大喝地挥霍无度,官员们中饱私囊,将帝国资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浪费、贪污在各朝代都很普遍。就拿罗马帝国早期的皇帝来说,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是卡里古拉、尼禄和韦伯芎的浪费无度行为,曾使国家的财政陷入彻底紊乱或完全破产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开征新税就成了弥补财政亏空的首选之策。卡里古拉就曾征收“前所未闻的新税”,以致“没有哪一种商品,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纳税”。^[4]¹⁷⁸韦伯芎统治初期便宣布说,“国家亏损达400亿谢斯铁尔提乌斯”,于是,他不仅“恢复了伽尔巴时期已废除的赋税,还规定了新的沉重赋税,行省居民缴纳贡赋的数量也增加了,有些省贡赋甚至成倍翻番。”^[4]³¹²

第二,不公平性。罗马帝国的税收政策一贯具有“重城市轻农村”的制度偏向,税量不均,税负不公,税率不一。国家对商业和工业的干预是后期罗马帝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帝国政府向农民征收较商人和工匠为重的税,这并不是因为农业创收的潜力更大,而只是由于商业税和手工业税不易征收。^[2]¹⁵³帝国政府一方面向农民征收重税,另一方面则为首都居民提供几乎完全免费的“面包加竞技”的奢侈生活。尤其是食物配给制度更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帝国政府将免费的食物分发给罗马城的居民,并以同样的方式发给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这是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贯彻的一项政策。这就必定使政府下令从北非和埃及以土地税的名目强制征收大量谷物用于此种目的……不久之后,君士坦丁堡接受免费粮食公民的数目达到了80000人。”^[5]¹²²罗马政府不仅在首都和行省实行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并且,由于阶段性的政治统治目的的不同,各行省税收的性质和征收方法也有很大不公平性。例如,尽管西班牙、

迦太基相对其他的行省更为富裕,但为了取得对这些地区的胜利,在那里征收了很少的税。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为了赢得人民的忠诚,罗马政府不仅没有增加赋税,反而减轻了税负,在每个城镇都只征确定数目的税收。西班牙所缴的税大约为什一税的一半。^[1]¹⁹³

第三,强制性。强制性是指税收的分配只是依据国家的政治权力,而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没有关系。这种强制性主要表现为强行收取。罗马帝国时期,“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得到了充分发挥。为了保证国家的收入,赋税的征收不仅有纳税人以田产抵押和人身占有等传统的向纳税人本人强行索取的办法,并且还实行了集体联保制,即把家庭成员、邻里、乡党和同业公会统统包括在内。^[6]⁵³⁹帝国时期,帝国地产的租税不再由包税人而由元首委派的“检察官”征收。^[2]¹⁵⁴然而,“罗马不大考虑行省经济的繁荣,不大顾及下层阶级人民的物质福利,而罗马统治却一天比一天更自私。罗马的行省长官和资本家可以说是毫无顾忌地在各行省中渔利,他们通常是最自私的精神和为了自身的利益来这样做。”^[6]²⁴

从以上可以推断,农民需要承受的负担中不仅有合理的部分,但更多的是不合理的、超过农民承受能力的部分。

二

农民负担过重是指农民的社会负担超过其现实承担能力的状况,这是相对于农民的收入水平而言的,主要表现在农民纳税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是逐渐呈增长的趋势上。就拿非洲行省来说,“在凯撒时代,非洲行省需交纳的谷物是30万蒲式耳,一百年后则增加到了1000万蒲式耳,尽管其间增加了在卡里古拉时兼并的毛里塔尼亚和一些以前免税的帝国地产,但谷物的增加量也是令人吃惊的。”^[1]⁴⁴²税负增加得如此迅速,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所远远赶不上的。两者的反差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过重。

农民负担过重是帝国时期一个长期存在而又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官僚机构的扩大和官员数量的增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个有效率、等级制的官僚系统对于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是必须的。罗马帝国早

期的成功之处在于用非常有限的官员来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仅仅几百名元老和骑士在国家奴隶和自由民的协助下管理着整个帝国。这种体制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交给了城市,也就是实行了地方城市自治制度。自公元2世纪至4世纪期间,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这些城市的自治消失,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逐渐形成,官员数目增加。狄奥在《罗马史》中指出:刚开始之时,罗马实行的是将几个行省合在一起进行治理的政策;直到公元21年,北部高卢各部分独立……随后,行省逐渐被细化,总督的权力被削弱,而政府对行省的控制加强了;到公元3世纪时,这一过程大大加强了。^[7]经过戴克里先的行政改革和税收改革之后,“行省的数目增加,行省里的官员增多了,因而政府官员的数目翻了一番。”^[8]琼斯则估计,罗马帝国晚期的文职官员(civil service即除士兵和司法人员之外的官员)大约有30000~50000人,而在2世纪末才有几百人而已。^{[5]107}官僚机构的扩大名义上是为了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但其根本的目的却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攫取财政收入;官员数目的增加则使政府的行政成本大大增加了。在奥古斯都时代,元老和骑士在行省任职时是不领取报酬的,皇帝自己的被释奴充当财务官,官僚机构中的各种差役都由奴隶和被释奴承担。但到罗马帝国晚期,这些人基本由出身自由的公民取代,并需支付薪饷。由于奴隶供应量的减少,这一政策还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公元三世纪时,一支日益庞大的骑士队伍在帝国政府的工资册上,需要支付10~3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薪金。”^{[1]481}由于这些不从事生产人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也在相应增加。这些行政费用当然只能由纳税者来承担。

其次,军队规模的扩大和军费开支的增加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对于有敌为邻的大陆国家必不可少。国内秩序的维持和边境的防卫,都需要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而数量众多的军队。经过马略的军事改革之后,罗马军队不再是自备武器的公民兵而开始变成了几乎和罗马社会的生产阶级没有关系的职业军队。这支军队有自己的阶级利益,它靠自己的饷银和一部分军事掳获物过活。因此,要使这些职业军人成为为国家效命守职的优秀军人,就必须使军队得到相应的酬赏,而且要尽可能地使当兵这个行业

具有吸引力。于是,军队的开支便成为国家财政中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并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恺撒时,士兵的薪饷是225第纳尔,没有食物分配,但那时士兵可以获得一部分战利品或从战后所建的殖民地分享收成。^{[1]336}在帝国时期,随着对外战争的停止,士兵几乎不再有战利品和殖民地的收成可分享,所以,政府不仅必须付给士兵薪饷,并且还要不断地增加他们的收入,供给他们食品和房舍。^[9]这必然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帝国军队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在恺撒之前,元老院不同意组建常备军,总担心再有人像马略和苏拉那样会滥用它。但在西班牙、非洲和东方战事接连不断,元老院不得不将常备军从卸任的执政官之手转入另一人手中。从西塞罗的书信中,我们发现,在正常时期,叙利亚、亚洲、比提尼亚、非洲、西班牙和山南高卢至少各有3个军团。因此,起码有20个军团在服役。^{[1]196-197}“在公元2世纪时约30万人保卫着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约5000万人的帝国……”。^{[10]25}戴克里先觉得,由于帝国疆域庞大,边境线长,帝国政府必须继续采用这支在帝国早期就已形成的职业的、长期服役的军队。驻防军队的人数不但不能减少,还应增加。经过他的军事改革,军队的规模进一步扩大,4世纪的皇帝也曾努力维持戴克里先时期的军队规模。并且,由于“罗马帝国的生存取决于三个条件:皇帝及其卫戍部队的支持、军队的承认和元老贵族的同意。”^{[11]147}所以军队对君主专制统治的维持显得极为重要,以致“公元3世纪的罗马,各个方面都是由军队保卫着的”。^[12]于是,在公元3世纪的极不稳定时期,“每个统治者的主要活动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来获取军队的忠心”,^{[11]148}他们不断地增加士兵的军饷。“最近的一项预算表明,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每年的军费预算大约在4.5亿至5亿塞斯特尔提乌斯。”^{[10]25}“在战争期间,肯定还需要征收新的和额外的税收,因为这时临近地区的军团也许也需要调来直接参加战斗。”^{[1]196-197}在骚乱时期,军队和行省耗尽了国家收入的绝大部分,一些行省所耗费的超过了他们所缴纳的税收。

其三,罗马城的粮食需求也是行省农民身上一项沉重的负担。罗马的粮食供应,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食物配给制,是历届皇帝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罗马经济发展和它得以生存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也是罗马城人口爆满的一个关键原因,

因为无产者能够依靠这份几乎完全免费的粮食维持生存。罗马城人口最盛时超过了一百万,它需要大量的粮食。奥古斯都在罗马城设立了一位粮食官(praefectus annonae),专门负责罗马城的粮食分配。慢慢的这种粮食官又扩展到了罗马行省的自治市中,对粮食供应和分配的管理成为罗马帝国治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职能。例如非洲,尽管粮食生产不是它的优势,但它仍被强制性地规定给罗马供应粮食。罗马政府对每一任统治北非的总督的首要命令,就是要给罗马运来更多的小麦、肉食、羊毛与橄榄油。这种政策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439年汪达尔人攻占北非为止,一共持续了近6个世纪。^[13]我们很难说出罗马城每年进口粮食的准确数字,但菲克·梅杰和奥诺·范·尼杰弗估计这个数目是非常大的,约为400000吨,根据是公元4世纪时埃皮托姆(Epithyme)的《关于恺撒》(de Caesaribus)和弗拉维乌斯·约瑟福斯(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战争》(Jewish War)这两部文学作品的残片。^[14]谷物救济分配由盖乌斯·格拉古开创。在西塞罗时,每个等候领取救济食物的穷人大约可分得15蒲式耳的小麦,克劳狄乌斯为了获得民众的欢心,通过法令将这项费用翻了一番。^[15]罗马城的居民得到了实惠,行省的农民却不得不常年背负着这一沉重的负担。

最后,国家还必须支付一笔巨额的公共娱乐活动费用,“早在克罗狄乌斯统治时代(相当于41-54年),社会节假日就有159天,其中举行官费运动会的日子就多达93天,占全年的1/4……截止到354年,全年举办运动会的日子多达175天,几乎是克罗狄乌斯时代的两倍,而社会节假日的总数则多达200天,或达半年以上。”^[15]另外,监察官还要划拨出年收入的1/5或1/10用于公共工程建设,如道路和输水道的修筑,城墙和公共建筑的修建和维修等。神庙经常由获胜的长官用战利品修建,有时也由他们捐资修建或者由他们的后代维修。但有时候,国家也会应大祭司的要求修建神庙和支付一定款项以表示虔诚。从苇伯芎到图拉真统治时期,在西班牙、非洲、高卢、多瑙河地区、阿纳托利亚和叙利亚修建了许多公路,政府还帮助城市修建公共建筑,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当然,大量的金钱是用在诸如罗马、雅典和迦太基之类的都城。为哈德良作传的作者指出:帝国几乎没有一座城市不为旅游者所赞美。所有行省的

考古挖掘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1]480-481}

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帝国政府的支出,毫无疑问,当国家的开支增加时,政府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于是开征新税、扩大纳税对象的范围和提高税率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最常用的方法。“罗马帝国从3世纪开始逐渐衰落,并接连不断地衰落直至灭亡。这种情况是课税问题,越来越被推到前台了。政府靠课新税来弥补国家的经常亏损,同时,把旧税更加推广开来……税率也在不断地提高着。”^[16]于是,帝国政府大大地扩大了纳税者的范围并相应地提高了税额,前面所引的卡里古拉和苇伯芎就是典型的例子,戴克里先的税制改革也是基于这一目的才实施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国家越是衰弱,它也就越发需要税收,因此,人们越是无法负担租税,租税也就越是要加重,结果罗马行省的税收很快就变得无法忍受了。”^[17]“面对日渐难以承受的赋税,富人们疯狂地寻求免税权,并千方百计地转嫁赋税,结果正如当时一位作家萨尔维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富人,迫使穷人负担他们的赋税,同时富人又对穷人提出新的勒索,迫使他们交付。税收的沉重负担连续不断地、令人无法忍受地落在农民头上。到帝国末期,土地税率超过共和国后期税率大约3倍,国家收取的税额,占全国农业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8]所有这些负担很快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罗马农民的身上。越来越多的地租,越来越重的赋税沉重地压在罗马隶农的身上,令其无法喘息。

三

罗马帝国时期农民负担过重对罗马帝国的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经济上看,农民负担过重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直接造成了土地的过度耕种,从而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的降低。土地的休耕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瓦罗借利奇尼乌斯之口表达了这一观点:“利奇尼乌斯说:土地每隔一年休耕一次,或者播种少一点,即是让土地歇歇劲儿,不要用得太狠。”历史实践也证明,间或休耕是农业经营的科学之道,是土地能够丰产丰收的必要作法。但罗马帝国的农民可能经营的土地数量极为有限,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得休耕根

本不可能。所以,他们只能年年重复耕种,并且,由于付出的劳动远远大于所得的收获,他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不再受到罗马农民的青睐和发扬。于是,经过土地的连年使用,以及低报酬所造成的农民的不用心耕种,整个种植业隐伏了巨大的危机,这就是我们从罗马史家的研究著作和皇帝们的敕令中所见到的危机。

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看,不堪重负的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激化,长期反复的、绵延不断的巴高达运动就是一场典型的农民反抗运动。显然农民运动不仅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力,而且他们的反抗壮大了反对罗马帝国的力量,这是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当绝大多数的人们(这些人不仅包括境外的外族人,也包括居住在境内的居民)都坚决地想要抛弃一个帝国的时候,这个帝国就注定会灭亡,这是历史的规律。

总之,罗马帝国时期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对此时的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罗马帝国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致命伤害,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衰亡。公元4—5世纪的蛮族入侵之所以取得成功,极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帝国境内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反抗帝国政府的统治,从而给予了入侵者以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能分崩离析。

参考文献:

- [1]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M]. New York, 1927.
- [2] Peter Gamsey. *Cities, Peasants and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 周 枏. *罗马法原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57.

- [4] 苏埃托尼乌斯. *罗马十二帝王传* [M]. 张竹明, 王乃新, 蒋 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5] Averil Cameron. *The Roman Empire A. D. 284 – 430* [M]. Fontana Press, 1993.
- [6] M·罗斯托夫采夫.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 [M]. 马 雍, 厉以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7] Barbara Levick.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M]. London & Sydney, 1985 10.
- [8] Lesley Adkins and Roy A. Adkins. *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Roman* [M]. Cambridge, 1994 45.
- [9] Alaric Watson. *Aurelian and the Third Century* [M]. London & New York, 1999 125.
- [10] D. C. Heath.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Why did it Collapse?* [M]. Boston, 1962.
- [11] Pat Southern.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Constantine* [M]. London & New York, 2001.
- [12] Ramsay Macmull. *Roman Social Relations 50B. C. to A. D. 284*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6.
- [13] 李长林.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1).
- [14] Fik Meijer and Onno Van Nijf. *Trade, Transport and Society in the Ancient World A Sourcebook* [M]. London & New York, 1992 98.
- [15]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247.
- [16] 汤普逊. *中世纪社会经济史: 上册* [M]. 耿淡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48.
- [17] 孟德斯鸠. *罗马盛衰原因* [M]. 婉 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04.
- [18] 王昌沛. 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亡 [J]. 齐鲁学刊, 2005 (4).

(责任编辑: 骆晓会)

(4) **Relation Marketing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LU Wenming(033)

Post-doctor Work Station of Manag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s Social capital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relation marketing. Relation network links relation marketing and social capital. To establish a relation network is to invest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encourages marketing and strengthens marketing network.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lation marketing network mode for reference and proposes that enterprises combine relation marketing with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s a developmental strategy.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relation marketing

(5) **Peasant Countryside and L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TANG Shu-yun(038)

Law Department,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Yongzhou Hunan 425100, China

Abstracts With the furthering of market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is changing from a full agricultural society into a half agricultural society.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eriod, some conflicts of peasant countryside and land arise. To construct a new countryside, the present situation, features, impact and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fully understood so as to determine proper policies and work focuses.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peasant countryside; land

(6) **On the Inter-regional Trade and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Integrative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FAN Dingxiang LU Zhiming(043)

Department of Planning & Modern Management,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s To realize synchronous opening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to domestic regions is quite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increase of regional competitive power. Inter-regional trade can improve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a reg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ccomplishment of inter-regional trade of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and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for the growth of inter-regional trade.

Key words inter-regional trade; integrative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regional competitive power; analysis of accomplishment

(7) **On the Burden of Farmers in the Roman Empire**YANG Junming¹, LI Ying²(063)

1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s In the Roman Empire the government forced at its will a lot of unfair and mandatory burden on farmers just because of its overstaffed organization and increased expenditure. It not only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but also accelerate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Key words the Roman Empire; burden on the farmers; taxes

(8) **Negativity of Hunan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Mao Zedong**

GUO Feng-lian(068)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Like other cultures, Hunan culture (also called Hu Xiang culture) has its negativity. Its negativity derives from its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Hunan culture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n Mao Zedong. Mao's errors in work in his later years had some cultural reasons. This analysis doesn't intend to deny the contributions of Hunan culture and Mao Zedong, but sticks to a dialectical,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when making a judgement.

Key words Hunan Culture; Mao Zedong; negative effect

(9)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 Names of Towns Under You County**

PENG Xue-kai(079)

Teacher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Many of the thirty towns under You county, like Shalingpo, Xinshi, Jiubujiang, Yatangpu and Pinyangmiaq are named after some famous buildings, bazzars and country fairs, and have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You county; name of the town; cultural implication; building; bazaar; fair

(10) **On the Ultimate Concern of the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LU Wen-liang(086)

Chinese Depart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reen thought" and "ultimate concern",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appear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modern aesthetics characterized by obsequiousness and revelry and has turned on a "green ligh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Exploration of the true meaning of "ultimate concern" has become the lofty task of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Appealing to men for a reunderstanding of their position in the entire ecological system, searching for the ideal road to a poetic living, awakening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anxie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exp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value of survival form are the core of "ultimate concern" of modern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ultimate concern; ecological crisis; survival value

(11) **On Max Bill's Mathematical Mode of Variant Creation**

SHAN He-fei; WU-wei(093)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eader of concrete art in Europe, Max Bill breaks through bounds of artistic spirit and brings concret art into a rational world of art through importing mathematical mode into it. His works give us a unique visual effect by using mathematical mode as the supporting point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